

3



0

新诗三百首 壹

主 编 牛汉 谢冕

壹

新诗 300 首



壹

中国青年出版社

牛 汉 · 序 一

我与诗相依为命已整整六十个年头，先说说我目前的状况与困恼。困恼，不仅在创作中有，首先是人生的：人和诗都活得很累。当今像我这样的人，为数不会少。有人劝我，说人活一世，何必自寻烦恼去写诗？没有诗人照样活着。我对他说：没有诗，我活不成。

记得前几年，我曾快活地说，近十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清醒的一段时间。好心的朋友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希望我真的能走出苦海，修成正果。我多么渴望享有迷梦和噩梦清醒之后的那种轻松与超脱！二十岁之前，我信奉莱蒙托夫的一句话：“让我尝一点蜜，我就可以死去。”可这点点蜜，一直没有尝到；我以为在

诗里能尝到，诗里没有蜜。

此刻，我真的清醒了，还是又在说天真的昏话？现实的人生境遇已经无情地做了说明，我的清醒只不过是一闪即灭的幻觉。那么，我如何能以爽朗清明的心神来构思这篇《新诗三百首》的序文呢？着实很为难，真不知道如何下笔。

回头看看近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和现实，如此地动荡，如此地丰富，又如此地严酷和悲壮，仅仅凭个人创作体验生发出的一点直觉感应是难以揭示其深邃而复杂的本质的。不善于理性思维和不愿回头观望的我，遇到了真正的大难题，唉，我只能大题化小地写写了。

今年初，我印了一小本散文，其中有三四篇是谈诗的，在《后记》里有几句说到了我这一生与诗的缘分：“由于长期陷落在历

史的断层之中，深切感知了人生的艰险与真谛；然而，与死亡相差无几的苦难和孤独，却反而使心灵获得了挣扎、奋发和超脱的求生力量。在危难中诗拯救过我，诗同时也令我蒙受了屈辱和灾难，但诗的正气又使我在世俗的纷扰中从未昏迷和堕落。感谢苦难而庄严的人生，感谢诗的灵光一直照耀并指引我匍匐前进！”这些沉重的苦涩，像从心里挤出来的粒粒汉字，看似扼要严谨，其实是泪眼回首，一片模糊，远没有把我和诗的全部经历与感悟诉述明白。此刻的我比写这篇《后记》时似乎清醒了一点，可我仍不得不承认，即使再苦苦地写上几千字，也难以解开我与诗的这个命运的死结。我这个人，对于人世间的许多难题都曾被追作过解答，有几次还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含泪供述了自己的清白。谢天谢地，在危难中，我常常奇异地清醒。可是，多少

年来,只要触及陷入危难之中的诗,我却从来没有谈清楚过,连一回都没有:我一生参不透他(有人把诗代名为她或它,我一直把诗视作雄性与神性,这或许就是我的狭隘和愚顽不化之处)。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朝向诗不断跋涉的苦行僧而已;我不信神佛,但我自小被信徒们的苦行精神所感动。小时候我见过蒙古人去五台山拜佛,一路磕头,膝盖跪得血淋淋的。

有不少哲人说,诗不仅能超越生命,而且能超越命运。我深信不疑。我就是怀着这个信念写诗的。但是诗人却永远走不到诗的尽头。所谓诗的超越本能,不是突然之间的飞跃;它的超越与不断的探索不可分,超越是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显现出来的。当然这只是我多年来的一点体验。我多么希望真的能看见几个飞跃的诗人,歌唱着越过天空。我一直认为诗与诗人是全身心

的融合,诗与诗人不存在任何距离。然而,诗人又时刻能感悟到诗永远只是在心中孕育出的预言,如美妙的梦境展现在远方。

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诗是诗人全部身心地和现实人生的融合,没有这个血肉的融合,诗和诗人都无法创造出赖以立脚的地方。

二

近几个月来,我的情绪不够平稳,常常为中国新诗的困苦现状和难卜的命运感到忧虑。与几个年轻的诗友交谈过,并不想写成文章。我的狂躁顽劣脾气已经收敛了许多,不想再惹事。

十五年前读到过一篇谈诗和现代人心灵的文章,印象很深。说美国诗坛从未发生过什么真正推翻一切的革命,而是一种有秩序且合乎逻辑的自自然然的发展。还读到惠特曼晚年写的几

篇回忆性散文，已经半瘫的老诗人说，当他回顾美国诗歌不长的历史，感到阵阵清风朝着他吹拂。他是公认的美国现代诗的开拓者，却绝无一点偏执的否定历史和新诗人的情绪。这些片断文字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怀着某种发现的喜悦心情，匆匆地写了一篇命题为《诗的新生代》的文章，评述了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生气勃勃的状况，从充满昂扬悲壮情绪的朦胧诗进入了一个广阔而显得平静自然的境域。一群一伙的年轻的诗人一声不吭地涌现在惊喜的读者面前。又过了几年，诗歌创作领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元的更为宽松的局面，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新来者。他们不是人们企望的闪耀着光彩的斗士，他们平凡而自在，从语言和情境显现出多年来难得见的个人的风度。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之间没有明显地出现所谓的“代沟”，或

互相排斥的撞击情况,相处得十分融洽,创作中相互尊重交流,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风格逐渐地靠近了。与当前(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诗坛呈现的现象形成对比,又引起我久久的苦思。

“文革”后期,许多经受过种种磨难和锻炼的青年诗人,怀着深重的忧患感和人生理想,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灾难相撞并联系在了一起,在创作之中显示出了高尚而坚贞的品质,敢冒杀身的风险,向黑暗的专制势力投射出了密集的火箭般的诗篇,为中国诗歌冲开了一道透亮的裂口,地火随即喷了出来。他们的献身和呼号唤醒并激活了一代纯洁的灵慧的后来者,也激励了不少年老的久久沉默的诗人。我就是久久沉默的一“分子”,那种沉默,在当时其实是抗争命运的奇特的“声音”。就在朦胧诗萌发的那几年,不少如我一样沉默的诗人,都先后沉雷一

样地醒了过来。新生代和更新的一代浩浩荡荡地涌现了出来，还有我们这些人归来，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动向，也是诗歌创作内部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被任何外部的非诗的势力操纵或诱导，是五十年来中国多灾多难的新诗获得的一次堪称划时代的真正的进展。

这个新诗的发展势头，仍在向更深广的创作境域喧闹着拓展着，探寻前进的路径，并不断地调整和丰富着生存的姿态。

三

沉甸甸的《新诗三百首》终于出版了。几百篇选目都是经由二十几位编委一一提名编定的，主编和任何一位编委都没有个人的决定权。整个编选工作是认真严肃的。

选目编定之后,令人十分的惊喜,不但看到近百年来先行者的足迹,还感到当前新诗形成的发展势头,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在这部诗选中切实体现了出来:入选的诗篇半数近二十年成长起来的具有才华与个人风格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新气象!

近百年来,几代令人尊敬的杰出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功绩,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诗具有里程碑的历史价值。

苦尽甘来,我终于尝到了一点点蜜。

祝中国新诗前途无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汗血斋

谢 冕 · 序 二

选诗取数三百首,这风气大概始自世传的“诗三百篇”。《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诗歌经典选本,自它诞生以来注家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汉以来至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关于《诗经》的注释、整理、研究、赏析、编选、翻译的著作,已达一千二百余部。其间毛传、郑注、孔疏等,本身也已成为经典。史传诗三百篇系孔子删诗所为,也有不同意此说的,但它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选本,却是没有争议的。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个经典选本的出现,不仅使《诗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诗学和文学理念,如“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以及“发愤而作”说,等等。这说明,这个诗歌选本在历代的流行和普及并非无因,是与它独到的诗学原则和标准相联系的。可以说,由于一个诗歌选

本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

《诗经》以后,历代以三百为数的诗歌选本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众者,当数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这个选本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遴选出最优秀的名篇佳作以飨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它对唐诗的普及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诗经》以外,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选本,就其影响与作用而言,很少甚至没有能与《唐诗三百首》相比拟的。究其原因,盖由于这一选本各体赅备、名家荟萃、选诗允当、少有遗珠所致。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树立了一种范式。它启示后人,一个成功的选本必须立足于一个诗歌时代的整体,把握这个时代普遍的诗歌特性,并通过选家独具慧眼的、大胆的选择以突出传达这个时代特有的艺术精神。在这里,整体的把握与独创性的眼

光的结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唐诗三百首》于是不仅成为一个诗歌黄金时代的缩影,而且成为产生了这一诗歌形态的伟大时代的缩影。

事情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大家就对“三百首”这样的选诗模式有了认同感和亲近感。这道理,一方面是由于三百首的数量适中,可以于方寸之间见浩阔壮大,也易于诗的普及和推广;另一点似乎更重要,取选诗三百有追慕前贤、效法权威的含义,希望自己的选本能像历史上的“诗三百篇”那样,选出个大家都首肯的权威性来。

至于把三百首的选诗模式引进到新诗中来,这风气似乎还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方才盛行。以往说到新诗取得的成绩,往往不那么理直气壮,特别是把新诗并置于古典诗歌的环境中谈论的

时候,更显得信心不足。现今这种采用“三百首”的模式编选新诗,是与人们对中国新文学取得业绩的体认,以及对新诗实践的成就的肯定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新诗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诗的最早实践是与当日的先行者对旧诗的批判甚至对立有关。当日新诗面对的形势,甚至比当日新文学革命面对的形势还要严峻。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古典诗歌的发展最充分,也最成熟。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已有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为此做出贡献。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被保留在历史中,它们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永远的珍宝和骄傲。而新诗在当时却是一片空白。它们之间的反差是太大了。

这说明,在新诗和旧诗这两个对立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力

量悬殊。在当时,用白话文来写诗,只能是一种大胆的梦想,而且几乎是一种冒险。在此之前,只有清末改良派进行过并不成功的“诗界革命”的试验可供参考。这样,白话新诗的实验者几乎是在无可比拟的巨大辉煌面前,从无到有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气势雄大的实践——它以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生,直接面对着一个历史悠久、成绩辉煌、并且达到了顶峰的巨大的历史事实!所以,对于新诗的实践者,一方面是创造的勇气和毅力,一方面则是始终存在着信心和力量的危机感。

“五四”新诗革命的试验,始于胡适的《尝试集》,而见端倪于郭沫若的《女神》和周作人的《小河》。随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诗人和作品。白话新诗试验的成功,是新文学革命最艰苦的一场攻坚战。新诗在旧诗面前的立定脚跟,为中国的新文学革

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不论新诗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博大精深相比,它始终处于弱势的状态。因此,直到新诗诞生数十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通过某个权威人士之口,仍然有着“迄无成功”之类的评语。这说明伴随着新诗发展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信心和评价的问题——在新诗的上空,始终笼罩着那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古典传统的影子。新诗的实验和成熟,始终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环境中进行的。

但上述那种大反差的局面,由于新诗历经曲折、但却切实有力的实践得到了改变。近八十年的实践证明,新诗的取代旧诗是合理的,而且这些实践还证明,新诗也是不可替代的。新诗已被证实它与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思维和情感的